

# 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与 公司所有权结构<sup>\*</sup>

吴金群<sup>1</sup>, 陈 凌<sup>2</sup>

(1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2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关键词] 意识形态; 公司所有权; 制度互补

[摘 要] 意识形态是对于世界看法的一套信念。21 个发达国家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左的意识形态与集中的所有权结构形成了均衡, 而右的意识形态则与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形成了均衡。因为制度互补关系的存在, 这两类均衡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08-0038-06

现代公司乃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公司的绩效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经济的繁荣或衰退。因为所有权结构是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变量, 所以, 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企业, 都十分关注公司的所有权结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把公司所有权的集中或分散归因于技术或经济因素。<sup>[1][2][3]</sup>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La Porta、Lopez-de Silanes、Shleifer 和 Vishny(简称 LLSV) 通过大量研究揭示了法律环境对于公司所有权结构的重要影响。<sup>[4][5][6]</sup> 与“技术或经济决定论”、“法律重要论”不同, 以 Roe 为代表的“政治观”更强调政治因素对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影响。<sup>[7][8][9][10]</sup> 不过, Roe 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完全的外生变量。这种把政治因素彻底抽离其经济基础的做法难以很好地说明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Belloc 等人试图把 Roe 的逻辑颠倒过来, 论证了公司所有权结构对意识形态的因果影响。<sup>[11]</sup> 遗憾的是, Belloc 等人的计量分析与

其文章所要研究的主题并不十分匹配, 而且对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

本文利用 21 个发达国家的数据, 在统计上验证了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从总体上说, 左的意识形态与集中的公司所有权结构形成了均衡, 而右的意识形态与分散的公司所有权结构形成了均衡。之所以会形成这两类均衡, 其主要原因在于: 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制度互补关系。

## 一、意识形态及其左右之分

目前, 意识形态已成为政治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共同研究的主题。从政治学的角度讲, 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 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转型的经验研究”(项目编号: 70472055) 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08-04-10

[作者简介] 吴金群, 浙江大学讲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制度经济学; 陈凌, 浙江大学教授, 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理论、比较经济史等。

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sup>[12](P368)</sup> 在经济学中,林毅夫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是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他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sup>[13](P379)</sup> 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指所有人在解释他们周围世界时所拥有的主观观念(即模型和理论)。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宏观层次上,他都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sup>[14](P36)</sup> 可见,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都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关于世界看法的一套信念,人们利用这套信念来解释、评价各类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sup>①</sup>。

意识形态的左派和右派之分,最初起源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15年法国君主制复辟以后,左派意味着支持革命,而右派则意味着反对革命。欧洲工业革命后,这两个词被用来表示面对劳工利益或私人资本利益的不同态度,左派倾向于支持工人的利益,而右派则倾向于支持企业家的利益。因为意识形态的左与右会在政治与经济上分别体现,所以,可根据政治与经济这两个维度对左派与右派进行细分,得到四种不同的意识形态<sup>[12](P433)</sup>:

(1) 政治上的左派。它通常相信人的进取完善能力和通过政治机构改善个人和社会的可能;支持变革;推崇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以及政治事务中的平等,从而推崇主权在民的主张;推崇博爱和国际主义。(2) 政治上的右派。它往往对能否通过政治机构完善人性持怀疑态度,依恋现行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反对人民主权,看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某些好处,并在态度上倾向于民族主义。(3) 经济上的左派。它追求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的利益,主张国家干预市场机制并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提供财政和社会福利保障。(4) 经济上的右派。它信仰经济领域内的选择自由,赞成自由市场经济和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赞成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实行志愿性自助和个人保险体制,不赞成由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中,政治上的左派或右派既可能与经济上的左派结合,又可能与经济上的右派结合。

政治上的左派和经济上的左派相结合,会产生保护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权;政治上的左派和经济上的右派相结合,会产生诸如法国激进派、德国自由民主党等政党,他们迷恋公民自由,支持企业自由经营;政治上的右派与经济上的左派相结合,会产生右倾激进主义、法西斯主义,它们信奉改良主义的军事政变;政治上的右派与经济上的右派相结合,则会产生保守的政党,如英国的保守党、美国共和党等。尽管如此,在世界政治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政治上的左派与经济上的左派相结合,或者政治上的右派与经济上的右派相结合。其他的两种结合一般都不稳定的,而且在当代民主国家几乎没有这样的政党是独立执政或占执政联盟的多数。所以,我们在后文中提到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左派或右派时就不再严格区分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

如果按从左到右的顺序,可以把世界各国的主要意识形态排列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一顺序的排列,就像微观经济学中的序数效用,虽然不能精确量化,但对于比较研究的确提供了足够的方便。表1反映的是OECD组织中富裕的21个国家在1975—2004年间,组成政府的最大政党分别属于左、中、右派的年数。从表中可以大致看出一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在“左右谱系”中的位置。有必要注意的是,表1中各国的左、中、右派的年份数,是其国内主要政党意识形态的相对比较,而非国际间的比较。比如在美国,民主党相对于共和党属于左派,共和党相对于民主党属于右派。在1975—2004年间,民主党执政12年,共和党执政18年。然而,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对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来说都是偏右的。又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属于左派,而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属于右派。在1975—2004年间,左派政党执政14年,右派政党执政16年。然而,无论由哪个政党组织政府,德国都接受并认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在尊重个人经济自由与主权的基础上,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利用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职能,保证社会公正与安全。所以,相对于美国而言,德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① 国内目前并不太提倡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左右之划分,但在国际上,学术界常致力于研究各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左右谱系”中的位置。本文将借助于具体的测量指标,来考察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把本文的结论应用于中国时应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

态长期以来都是偏左的。因此可以说,表 1 反映的主要是一国范围内意识形态左与右的对比。下文中我们将更

为关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比情况。

表 1 OECD 中富裕的 21 国 1975—2004 年间左、中、右派执政年份数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国	美国
左	13	25	30	20	15	22	15	14	20	0	0	1	11	12	17	12	14	21	16	12	12
中	0	0	0	0	0	8	0	0	0	18	25	0	0	0	0	4	5	2	1	0	0
右	16	5	0	10	15	0	15	16	10	12	5	29	19	18	13	12	8	7	12	18	18

资料来源:根据 World Bank(2005)的 DPI2004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中相关资料整理。表中左、中、右年数相加少于 30 年的,说明这个国家在 1975 年后有个别年份没有正常的政党活动。

二、分散均衡与集中均衡

我们选取前述 21 个发达国家作为样本,构建了一个有关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小型数据库。反映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指标是“雇佣保护”与“政治位置”。“雇佣保护”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上雇佣保护立法的严格程度,它已经被标准化为从 0 到 6 之间的数字,数字越大说明对劳工的保护越好。因为左派的意识形态更为注重对劳工的保护,而右派的意识形态则更为注重对资本所有者的保护,所以这一指标的得分高低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状况。为与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数据匹配,我们选取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数据,其资料来源于 OECD 的报告。<sup>[15]</sup>“政治位置”指标反映的是政治(学)专家对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评分,从左到右计为 2 到 4 分。越靠近 2 分,意味着意识形态越偏左;越靠近 4 分,意味着意识形态越偏右。有关这一指标的资料来源于 Cusack 的研究成果。<sup>[16]</sup>

反映一个国家公司所有权结构的主要指标是“lar10”、“lar20”、“med10”、“med20”。其资料来源于 LLSV 的研究成果,<sup>[5]</sup>计算所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1995 年末。指标“lar10”的计算,是在最大的 20 个公众公司中,如果没有一个股东拥有 10% 或以上的股份,则得 1 分,否则得 0 分,然后平均。指标“med10”的计算,是在市值超过 5 亿美元的中等的 10 个公众公司中,如果没有一个股东拥有 10% 或以上的股份,则得 1 分,否则得 0 分,然后平均。“lar20”和“med20”值的计算只要把大股东的占股比例从 10% 改为 20% 即可。所以,这类指标的数值越大,

说明股权越分散。

根据 LLSV 的研究,股权保护与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分散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sup>[4][5][6]</sup>根据 Pagano 等人的研究,股权保护与雇佣保护呈负相关关系。<sup>[17]</sup>因此,有必要控制股权保护对雇佣保护与公司所有权结构相关性研究的影响。我们采用 LLSV 研究成果中的防董事权利(anti-director rights)来度量“股权保护”。<sup>[4]</sup>这一指数包括六个方面的得分:(1) 邮寄投票权,允许股东将其投票邮寄给公司的为 1,否则为 0;(2) 股票无阻碍卖出权,法律禁止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要求将股票缴存的为 1,否则为 0;(3) 累计投票权或比例投票权,法律允许股东在选举董事时采用累计投票权或少数股东可以提名等比例董事的为 1,否则为 0;(4) 受压少数股东保护机制,少数股东有权挑战董事会或股东会决定权利的为 1,否则为 0;(5) 优先认股权,法律赋予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新发行股份的权力,且这种权力只能经由股东投票加以限制的为 1,否则为 0;(6)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最低股份比例不大于 10% 的为 1,否则为 0。

表 2 是 SPSS13.0 给出的描述性统计情况。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股权保护程度与反映公司所有权分散程度的四个指标中的三个(“lar10”、“lar20”、“med20”)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492、0.534、0.548),与反映意识形态的雇佣保护程度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88)。这进一步验证了 LLSV、Pagano 等人的结论,说明的确应该对各国的股权保护程度进行控制。控制了股权保护程度以后的偏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一国的雇佣保护程度与

“lar10”、“med20”这两个所有权分散指标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sup>①</sup>, 相关系数分别为-0.480、-0.794。“med10”指标因与股权保护程度无显著相关, 所以只需观察相关性分析结果即可, 其与雇佣保护也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0.615。因为政治(学)专家评分的政治位置与股权保护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所以不需要进行偏相关分析。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政治位置与“lar10”、“med10”、“lar20”、“med20”等四个所有权分散指标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695、0.553、0.699、0.654。

因此可以认为, 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在总体上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越是偏右, 其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越分散;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越是偏左, 其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越集中。也就是说, 右的意识形态与分散的所有权结构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 而左的意识形态与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构成了另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我们把前者称为分散均衡, 后者称为集中均衡。Belloc 等人认为, 自发的经济力量有一种集中资本与分散劳工的趋势, 而工人的联合或股权的分散则往往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当政治抢在经济力量与大股东之前发挥作用, 并预期到否则就可能出现股权的集中时, 则会形成分散均衡; 当经济力量抢在政治因素之前发挥作用, 结果就是资本集中与劳工分散之间的强烈不对称, 这种不对称会激起政治行动以加强劳工保护, 便会形成集中均衡。因此, 在分散均衡中, 右派的意识形态是因, 所有权的分散是果; 在集中均衡中, 所有权的集中是因, 左派的意识形态是果。<sup>[11]</sup>然而, 这一逻辑存在明显的缺陷。一个国家公司所有权的集中或分散、意识形态的偏左或偏右, 实际上是各利益集团于特定制度背景下在经济或政治层面上动态博弈的结果。这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均衡或者根本不可能达成, 或者即使存在也将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 存在两种均衡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在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具有制度互补的关系<sup>②</sup>。

① 我们也做了所有权分散与股权保护之间的偏相关分析(控制雇佣保护变量), 意外地发现: 所有权分散与股权保护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即使是在 0.10 的显著性水平上)。这一发现意味着意识形态可能比法律对所有权结构的影响更为关键, 毕竟法律只是政治的产物而已。

② Belloc et al (2005) 试图揭示政治、技术与公司治理的协同演化路径, 但其计量研究的重点是公司所有权结构对意识形态的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解释逻辑与其有很大的差异。

表 2 描述性统计

	Mean	Std Deviation	N
lar10	0.2619	0.26968	21
med10	0.1095	0.14800	21
lar20	0.4000	0.28460	21
med20	0.2414	0.25601	21
政治位置	3.1581	0.60766	16
雇佣保护	1.9476	0.97807	21
股权保护	3.0000	1.41421	21

### 三、两种均衡内部的制度互补

一般而言, 制度间共时性相互依赖可能会作为每个博弈域的均衡结果而出现, 当另外的域存在一种合适的制度时, 本域只有一种制度富有生命力(反之亦然)。那么,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是所谓的“制度互补”。<sup>[18] (P228)</sup>制度互补并不意味着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肯定是帕累托最优的, 但它能够经受住那些试图克服单个域中的非效率制度安排努力的干扰。

在一段较长的时期中, 如果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总体上偏左, 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策会注重社会公平的目标, 更倾向于保护雇员而不是股东的权益。左派的意识形态迫使经营者背离对股东的完全忠诚, 通过弱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制度, 使得经营者更多地与员工“捆绑”在了一起, 去共同追求公司规模扩展、就业岗位的稳定以及避免本来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风险。或许, 对于大多数雇员来说, 生活变得更美好; 对于许多因为历史上存在太多不稳定的国家来说, 得到了长期渴求的社会团结。但对于所有者而言, 公众公司的内部结构却变得更不稳定了。因此, 左派意识形态使得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大大提高。为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 公司的所有者会集中其股权来加强对代理人的监督。而股权的集中又会引起雇员对所有者过分强大的担忧, 从而激发劳工

采取联合的政治行动来加强对其利益的保护,并使原来左的意识形态更趋稳定。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司所有权从一开始就因为各种经济或历史的原因而趋于集中,那么作为占选民多数的雇员就会采取政治行动来保护其权益,从而导致左派意识形态(如社会民主主义)高涨,而高涨的左派意识形态又会促使所有权的集中更加稳固。所以,一个左派的意识形态与集中的公司所有权结构间的制度互补关系就形成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总体上偏右,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策更倾向于保护所有者而不是雇员的权益。右派的意识形态往往以雇员的利益为代价,通过促使经理人按照所有者的利益行事来解决所有者与雇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有了较好的股权保护,以及一系列使经理人服务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装置”,所有者不仅可以通过发达的证券市场分散投资从而降低风险,而且不必通过集中股权来降低代理成本。如果股权没有集中,雇员就不再担心其利益会受到资本的过分损害,因此就可能不进行太多的政治行动。或者,即使试图采取政治行动,也会因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其不利而难以取得预想的结果。这样,原来右的意识形态就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司所有权一开始就因为历史或法律的原因而趋于分散,那么雇员的政治意识就不一定会被激发,而分散的所有者则会试图谋求各种法律保护,从而诱发右派的意识形态。右派的意识形态通过提供对股权的有效保护从而加强了所有权的分散趋势。所以,一个右派的意识形态与分散的公司所有权结构间的制度互补关系得以形成。

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与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是一种相互加强的制度互补关系。一个国家的这种制度互补关系一旦形成,因为比较制度优势的存在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也不会轻易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直到如今依然保持多样化的原因之一。

## 四、结 语

我们选取了OECD组织的21个发达国家作为样本,构造了一个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小型数据库。SPSS软件分析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从总体上看,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越是偏右,其公司

的所有权结构越分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越是偏左,其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越集中。也就是说,右的意识形态与分散的公司所有权结构形成均衡,而左的意识形态与集中的公司所有权结构形成均衡。我们把前者称为分散均衡,后者称为集中均衡。正是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具有互为因果与制度互补的关系,即使在全球化时代,这两类均衡依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那种认为公司所有权结构必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趋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忽视了公司所有权结构嵌入于其中的政治环境的影响。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强调意识形态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的制度互补关系,并不否认或完全排斥其他因素对意识形态或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影响。我们只不过强调了意识形态这一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因素对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影响,以及公司所有权结构反过来又会对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 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3] Harold Demsetz and K. Lehn.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 93(6).
- [4] Rafael La Port,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Law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
- [5] Rafael La Port,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54).
- [6] Rafael La Port,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
- [7] Mark J. Roe. Political and Legal Restraints

- on Corporate Control[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0, (27).
- [8] Mark J. Roe. Strong Manager, Weak Owners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9] Mark J. Roe. Political Preconditions to Separating Ownership from Control[J]. Stanford Law Review, 2000, (53).
- [10] Mark J. Ro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1] Marianna Belloc and Ugo Pagano. Co-Evolution Paths of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Z]. ECGI Working Paper, No. 36, 2005.
- [12] 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 [13] 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 R. 科斯, A. 阿尔钦, D. 诺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14] 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益[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15] OECD.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4[DB/OL]. [http://www.oecd.org/document/62/0,2340,en\\_2649\\_201185\\_31935102\\_1\\_1\\_1\\_1,00.html](http://www.oecd.org/document/62/0,2340,en_2649_201185_31935102_1_1_1_1,00.html), 2004-10-08.
- [16] Thomas R. Cusack. Partisan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 Changes in Public Spending in the Industrialized Democracies 1955-1989[J]. Public Choice, 1997, 91(3-4).
- [17] Marco Pagano and Paolo Vo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4).
- [18]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 Ideology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U Jin-qun<sup>1</sup>, CHEN Ling<sup>2</sup>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7, China)

**[Key words]** ideology;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structural complementarity

**[Abstract]** Ideology is defined as a set of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alysis of a sample of 21 developed countries reveals that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ideology of a country and its ownership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The authors find out that balance is achieved between the left-wing ideology and centralized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between the right-wing ideology and dispersed ownership structure.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systemic complementarity, these two types of balance are highly stable.

[责任编辑 陈翔云]